

执行周恩来同志电令保卫南浔嘉业堂藏书楼追忆

沈如淙

在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文章当中，看到记述他关怀祖国文化遗产，在解放初期日理万机之中，电令保护吴兴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的光辉事迹，我不禁万分激动。对人民的好总理，伟大的周恩来同志益增怀念和崇敬。因为我是周恩来同志这项命令的一个具体执行者，看到此事的记载，倍觉亲切和感动。

嘉业堂藏书楼，位于现湖州市南浔镇，是闻名中外的文化宝库。自清末到解放前，经过刘锦藻、刘翰怡父子两代经营，花费八十万银元，收藏了十六、七万册图书，内有不少宋元善本古书和珍贵手稿、抄本、木刻、书板三、四万块。过去称为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1949年4月，解放大军渡江后，江南迅即解放。周恩来同志刚进入北京（当时称北平）不久，正在协助毛主席指挥解放全中国，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忙当中，他还想到远离北京的水乡市镇上的这座藏书楼，电令加以保护，谁又能不为之感到钦佩和尊敬呢？！

当时嘉兴县解放不久。六月下旬的一天（具体日子记不起来了），嘉兴县委接到省地委转来的周恩来同志的电报，命令立即派出部队保卫嘉业堂，防止破坏。省、地委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嘉兴县委，要嘉兴县委调遣武装去保护南浔藏书楼。这时嘉兴县委已经建立，嘉兴独立营刚于六月一日由原独立团整编建制。杨铭同志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嘉兴独立营政委。县委接电报后，杨铭同志把电报交给了我，要我执行周总理交来的电令任

~ / ~

务，我们感到任务的光荣和重要，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当即决定指派嘉兴独立营第一连，由指导员胡国钧、连长沈英杰带领，连夜赶往南浔执行任务。第二天，我和杨铭同志到南浔检查了一连保护藏书楼的保卫工作，去嘉业堂了解部队驻防保卫情况，参观了藏书楼。藏书楼是一幢四面连接，呈口字形的楼房，宏大宽敞，严密坚实，四楼四底共五十余间。楼上书厨密布，古籍琳琅满目，另一厅内密密麻麻地排着木刻书板，真是名不虚传的文物宝库。藏书楼东面是刘家的中西合璧式的住宅、家祠和花园小莲庄，部队即驻扎其间。我在那里了解了情况，交代了任务，研究了警卫措施，然后去湖州开会。

一连的干部战士的情绪很高，在南浔很好地执行了保卫藏书楼的任务。为了保卫祖国的文化瑰宝，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南浔附近的匪特不甘心失败，在部队进驻后，仍然企图伺机疯狂破坏。就在第一连进驻小莲庄第三天下午，一连文书沈向荣同志（中共党员，崇明人），在藏书楼通往市街的弄口，突遭两个土匪袭击。两匪扑向沈向荣同志夺枪，沈文书奋勇反抗，力拒两匪，他们见夺枪不成，即向沈文书连开数枪，沈向荣同志当场牺牲。连队闻讯，立即出动追捕两匪。在当地农会干部（其中有一女同志）、群众协助下，两匪当天即被捕获，关在一间靠河民房内。夜间一匪跳窗逃跑，落入河中淹死。另一匪被押送至嘉兴独立营营部，由营长刘先正同志审讯后，报经上级批准处决。在审讯中得知两匪系国民党潜伏下来的马文龙匪部残匪。烈士洒血卫典籍，嘉业堂完好地保护下来了。

事隔三十五年，我在1984年夏重访了南浔，到嘉业堂参观。只见楼宇依旧，建筑正在修葺，藏书依然满楼，管理工作做得很好；

堂东小莲庄园林花木茂盛，池波荡漾，假山上亭榭内青少年游人笑语不绝，一片欣欣向荣气象。使我联想起三十五年前的往事，无限缅怀关怀这座藏书楼的敬爱的周总理，也深深怀念那位为执行党的任务而献出年轻生命的沈向荣烈士。

“七君子”监狱生活见闻

张在扬

一九三五年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步步进逼，已强占东北华北大量领土，激起全国上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当时沈钧儒率先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沪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一九三六年又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开展抗日民主运动。而国民党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外投降卖国，对内镇压“异端”，遂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悍然非法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人，扣上“危害民国”的莫须有罪名，投入苏州监狱，制造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笔者当时年仅十二，是个小学生，懂事不多，也居姑苏，家庭与沈钧儒系老亲。“七君子”在苏州扣押期间，曾“探监”看望过沈公，也见到诸爱国领袖，他们监狱生活的情况，以及长辈们谈论他们监狱斗争的种种，给笔者幼小心灵中留下一定印象。虽事隔四十多年，还能依稀记得。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国民党当局伙同租界巡捕，从沈公住宅晒台上翻入内室，非法将沈公秘密拘捕，大概对其他几位也是“统一行动”。旋即解到苏州，沈公等六位男性爱国领袖羁押在学前街苏州监狱，史良关押在道前街高等法院女监内。监禁初期，管得较严，随着形势变化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开始“外紧内松”，不过对外界接触还是严禁，除了直系亲属定时开放外，其他人员概不接见。三七年春，笔者奉父母之命，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随沈公长子沈谦伯一家，混在他们孙辈之中，进监探望沈公。

苏州监狱是个江苏省的大狱，位在国民党政府的西侧，离我家不远，每天上学是必经之路。过去经常看到囚犯们带着脚镣，在军警押看下，外出做苦役，如今随着大人要进入监狱，不免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监狱大门有荷枪实弹的军警站岗，进入内厅一侧，又有二扇黑漆铁皮大门紧闭着，二个法警在旁看守。经交涉并查翻带进的东西之后，才打开铁门大锁放进内院，六位爱国领袖被软禁在这个独立的院子里。内院又是另一番景象，没有军警看管，尽可以在院内自由走动。一排半新旧的西式平房，有六七间，大概是每八一间，有十多平方。室内床铺桌椅齐全，朝南有块空地，正好是一片排球场。四周有铁筒似的高墙，同外界隔绝。那天正值“探监”日子，已有家属和孩子在屋内玩笑。爱国领袖们，有的在唱救亡歌曲；有的在伏案写作；有的在阳光下看书；也有玩排球的。亲属们送来的东西很多，不分你我，分而食之，相当热闹。

在狱中时，沈公年近六旬，矮矮的身材，长长的髯须，显得很有精神。老人家依然是那样乐观、开朗、慈祥，见到我们去探望很高兴，跟子媳辈谈家常，也不忘和我们孙辈们逗玩。拿水果招待我们。据说沈公还是和往常一样，清早起身早锻炼打太极拳。在狱中

要数沈公年纪最大，受到难友们对长辈般的尊敬和照顾。一起学习，一起斗争，生活很有规律。事后才知道“七君子”所以在狱中能获得这样的“优待”，是全国各界发起声势浩大的救援“七君子”运动，是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无辜的沈公等七人，也是“七君子”在狱中坚贞不屈，善于斗争才取得的。

在监狱里的斗争没有停止过，他们自订严明纪律，凡是亲友们送来的东西，统一保管，统一分配，也用来接待前来探监的孩子，所以孩子们都喜欢到那儿去，甚至乐而忘返。沈公非但逗我们玩，也不放过机会向孩子宣传抗日。他老人家曾亲自用通俗的语言，指出蒋介石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和“对内团结、对外抗日”的道理。当时社会上有些群众，出于爱国正义，怀着崇敬的心情，通过各种道路，秘密地请求爱国领袖们签名题词的也不少，他们总是满足人们的要求，实际上也起了宣传抗日的的作用。苏州监狱西北角仅一墙之隔，便是苏州英华女子中学，学生们经常以齐声高唱“毕业歌”支持被监禁的“七君子”。爱国领袖们也以“同学们，大家起来……”来鼓舞、来回答爱国学生，歌声此起彼伏，互相支持，互相鼓舞。

一九三七年“端午节”前夕，按当地风俗，我们奉母命进狱给沈公送肉粽。沈公很高兴，当场挥笔写了一信，让我们带给母亲，暗示不久将可胜利出狱。这张信笺带来了喜讯，我家一直当作家珍收藏，可惜在十年浩劫中散失。

~5~

国民党当局企图把非法逮捕“七君子”合法化，来欺骗人民，经过长期准备，曾在苏州演过一场审判“七君子”的丑剧，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审判在苏州高等法院进行，虽属不公开审判，谢绝旁听，却引起人们的关注。全国许多有名的大律师为申张正义，纷纷表示愿为“七君子”当义务辩护律师。当地群众也拥向街头，向爱国领袖致意，把苏州监狱通往高等法院的养育巷挤得水泄不通，当局为防止意外，动用军警和救火车压阵。沈公是我国法学界的前驱和权威，当时司法界人士大部分都是沈公的门生或熟人。审判一开始，沈公就运用丰富的法律知识，提出了法官与被告的关系，应“回避”，使审判无法进行，只得宣告退庭，一场丑剧草草收兵。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的形势已经形成，国民党当局遂于三十七年七月卅一日将“七君子”释放出狱。国民党政府制造“七君子”事件不但没有把高涨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压下去，反而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

丰子恺生平事略和我对他的回忆

丰 桂

(一)

丰子恺先生名润，又名仁，字‘慈玉’，别署“缘缘堂主人”。1898年11月9日（农历9月26日）生于浙江省崇德县（今桐乡县）石门湾。父 斛 泉公，名璜，清光绪举人。姊妹十人，先生行七。九岁丧父，十七岁以首屈第一名之成绩，毕业于石门湾“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后以第三名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二十二岁与崇德徐荫荪先生之女徐力民女士结婚。同年夏毕业于

“一师”。在校从李叔同老师学图画、音乐，从夏丏尊老师学习写作，从此奠定了他一生的事业与前途。后任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教师，二十四岁赴日本。因家道中落，曾卖去房屋一间，向族夫周印池借款四百元，岳父为其约了一个一千元与会，始得成行。在日本进“洋画研究会”“音乐研究会”及外国语学校学习，仅短短十个月，舍尽回国。二十五岁任上虞春晖中学教师，二十七岁与匡互生、夏丏尊等筹办“立达学园”于上海江湾，同时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三十三岁遭母丧，为永远纪念这位一身兼任严父慈母之职又含辛茹苦抚养教育其成人的母亲，遂蓄须。母逝后，曾迁居嘉兴杨柳湾。三十五岁仍回上海，任开明书店编辑。三十六岁建“缘缘堂”于石门湾梅纱弄，堂额为马一浮先生所书，先生自题“欣及旧楼”门匾。“缘缘堂”系先生亲自绘图设计的一座中国式宅院，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朴素深沉之美，先生曾在此度过了他一生创作上的黄金时代。一九三八年一月被日寇焚毁，先生异常愤慨，先后写：“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三文。

抗日战争开始，先生时年四十，率全家转徙桐庐、萍乡、长沙，翌年至桂林，应桂林师范之聘，曾在该校执教。后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相邀至宜山，在“浙大”任教。后又随校迁至“遵义”。四十四岁应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陈之佛之请，赴渝任该校教授兼任教务主任，不久辞职，于重庆郊外沙坪坝庙湾自建小屋三间，命名为“沙坪小屋”，赖写作卖画为生。先后在重庆、长寿、涪陵、鄧都、南充、阆中、隆昌，成都等地举行个人画展。

抗战胜利后，复员返沪，曾在汉口、南京展出抗战八年积稿260

件。四十九岁回故乡访问亲友，作“胜利回乡记”，以记其事。五十岁，于上海大新公司举行画展，所得悉捐“立达学园”充复校基金。同年又为故乡石门小学重建校舍捐画义卖，因故居已成废墟，遂移居杭州里西湖静江路35号，此时仍以写作，卖画为生。

新中国成立后，从一九五四年起居上海陕西南路39弄93号，名其室曰“日月楼”。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美协常务理事、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市文联副主席、美协上海分会主席、对外文协上海分会副会长。一九六〇年起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时年六十三岁。一九七五年四月，先生年七十又八。由弟子胡治均及次女宛音陪同，重返故里，宿南深浜胞妹“雪雪家。消息传开，每日访者常盈户外，交谈甚欢。他写贺知章“回乡偶书”多幅，加跋曰“离乡近四十年，重省故园，亲友凋零，儿童长大，屋宇全新，林园畅茂，如渔人之入桃源仙境，亦惊亦喜，梦耶？非耶？写贺知章此诗感。”分赠亲友，籍留纪念。

“文革”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迫害，使丰子恺先生身心倍受创伤，不幸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病逝上海华山医院，终年七十八岁。十九日，上海画院为先生举行追悼大会，沈柔坚到会表示悼念，全国政协、上海市政协、上海画院等单位送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丰氏生前友好陈望道、苏步青、刘海粟、吴梦非、刘质平、唐云等。不久，海内外唁函、唁电如雪片飞来，表达了人们对一代艺术家的深切怀念之情。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党又为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在上海隆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骨灰盒存放上海龙华革命公墓。

丰子恺先生在数十年的美术教育和创作活动中，以锲而不舍的

坚强毅力，苦心耕耘，他的译著和美术创作甚富，计有180多种，其中翻译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用力最多。

丰子恺先生是我国杰出的美术家、教育家、文学家，以漫画著名于世。先生思想受弘一法师（李叔同）和马一浮影响最大，对万物有丰富的爱，其创作与其生活相关联。新作漫画具天真之美，寥寥数笔，神情跃然纸上，而寓意又特别深长。其散文亦为人所喜读，任何琐屑细小之事物，一到先生笔端，就有一种风韵，真是“不但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

丰子恺先生高超的艺术才能，固然令人钦佩，但其真率、正直、光明磊落之人品，更受人尊敬，著名画家刘海粟称颂谓“精神万古，气节千载”。

一九八四年九月系丰子恺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桐乡县及石门镇人民政府为传播先生之艺术思想，鼓励后人学习其崇高品质及苦学精神，决定拨款重建“缘缘堂”。八月十日举行奠基仪式，即日动工兴建，其间还得到先生海外故旧捐资助建，先生泉下有知，当含笑以待。

(二)

我是丰子恺先生的侄女，从儿童时代就受到他的教育和影响，印象深刻，经久弥新。他的高尚人品，特别是对少年儿童的关怀，每一念及，使人崇敬不已，他晚年经历十年浩劫，身处逆境，乐观镇定，更令人感怀难忘。

我在少儿时代与子恺叔一家同住石门镇。我同他的女儿宝姊（陈宝）、先妹（宛音）、宁馨年令相近，一起长大，石门老屋

“悖德堂”、平屋及“缘缘堂”中深印着我们儿时的踪迹。记得“缘缘堂”未建造以前，这块基地上原有三间平屋，后面有一大片场地。恺叔为了让孩子们课外活动，就找人建造了滑梯、跷跷板、秋千、沙坑、跳高架子等等。这些设备现在看来虽属平常，但在半个世纪以前，在这古老的小镇上，不要说普通人家，就连学校中也没有。子恺叔从卖文所得中为孩子添置这些设备，使我们课余既锻炼了身心，又增加了乐趣，他对少儿的教育是多么注重！

一天，在门边，在滑梯、秋千架等处的柱上，我看见一叠叠柔软吸水的纸，下边摆了一只竹篓，“这是做什么的？”我问宝姊，她说：“纸是爸爸给我们揩鼻涕吐痰用的，揩后、吐后，把纸丢在竹篓里”。现在想起来，恺叔对儿童的关怀教育，真可说无微不至。他处处照顾孩子，又培养他们好的卫生习惯，多么周到！

后来，“缘缘堂”建成，华瞻弟、元草弟、一吟妹相继长大。除了后院葡萄棚下仍设有秋千架外，另外做了画有象棋和围棋盘的小方桌，供大家下棋用。记得一次，恺叔出了一个题目叫大家作文，题是：写一份下象棋的说明书。他说，某人不会下象棋，看了你的说明书，他就会下了，你该怎么写？望仔细想想。他在孩子的娱乐中培养我们的思维和表达能力。

恺叔对孩子的美育很重视。“缘缘堂”中添置了留声机，备有许多唱片。我记得有京剧“四郎探母”、歌曲“渔光曲”、“迷途的羔羊”等。对好的片子，恺叔不但要大家学着唱，还要大家用笔把谱记下来，看谁记得正确。培养我们不但会唱词，还能看谱唱曲子。

有发条可自行开动的小火车，我们觉得最希奇，玩得最有兴趣，

铁轨可装卸，恺叔要孩子们先装沪杭线，再装浙赣线。在铁轨上贴出该线全长，起点和终点，贴出沿线站名。如此由近及远，京沪线、陇海线、平汉线、粤汉线……，他就是这样教我们学地理，爱伟大的祖国。今天回忆起来，恺叔真不愧是一个辛勤的园丁，他给孩子们玩玩具，在玩当中启迪大家的智慧，增长知识，用心真可谓深矣！

“缘缘堂”中备有三轮、两轮脚踏车、木马、溜冰鞋等等，大大小小的孩子，可自行选择玩那一样。至于报纸、杂志、画报，邮递员每天送来一大捆，不但有国内出版的，还有国外出版的，可任大家挑选阅读。

当时家中一些年长者，都认为恺叔化钱大手大脚，用之不当，他们那里懂得这些钱对于培养教育下一代的深长意义呢？

我在恺叔身旁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和姊妹们一起上学，一起生活，一起参加课外活动，受到了恺叔的教育，得到了我从父母那里得不到的东西。后来，我们分离了，可是恺叔还一直关怀着我。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我在山区求学，恺叔从贵州遵义远道给我寄来一幅画，正中是一棵松树，后面是彩霞、山谷，题字是：“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蓉廌侄女座右。”他期待着和平日子的到来，勉励我努力学习，好好做人。

岁月流逝，昔时我这个小女孩也已经两鬓频添白发。经历了“十年浩劫”，我对恺叔的崇高人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文革”中，他倍受迫害摧残，可是他仍然是乐观、坚定、勤奋学习；仍是他人第一。石门镇人何英娥在恺叔家帮助处理家务多年，一九六八年偷偷地来我家，对我母亲说，恺叔被揪斗回家，仍然神气如旧，喝一点酒，什么也看不出来，其实是怕家里人难受。她又说：恺叔

~//~

不管怎样，仍是早上五时左右起身，画画、写文章，从不间断。我和母亲听了都油¹。壹起来，同时我们也感到很大的宽慰，我们觉得恺叔的宽广胸怀，是一定能战胜逆境的。一九七五年恺叔兴致勃勃地重游了离别三十多年的故乡，我们重又相见，真为他的精神状态感到高兴。这里附带讲一下恺叔对别人的尊重和保护，英娥在他家帮助家务二十多年，恺叔从不把她当做下人对待。“文革”前，母亲每年秋天到上海恺叔家，住个把月，帮助婶妈徐力民翻丝棉，看英娥性子很躁，婶妈买菜回来，她常挑剔什么黄鱼太小，猪肉骨头太多，有时还让婶妈去重买。他们亲如家人，叔婶从不计较她的态度，恺叔称赞她菜烧得好，吃饭时三番两次叫她同桌一道吃。英娥早已把自己当成他们家的一员，忘了自己姓何，分享了他们的欢乐，也一起度过了患难岁月。

敬爱的恺叔离开我们已经九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常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的崇高精神将激励着我振奋努力永远向前。

1984年9月恺叔逝世九周年写于石门镇

嘉兴女子教育的先行者方英

张志梁

嘉兴女子师范学校始创人方英（1878—1939）字景昭，嘉兴马厩汇人，嫁同邑张氏。结婚时，夫已病入膏肓，不久即成寡孀。青年守寡，痛不欲生，幸有未嫁小姑日夜伴护，劝慰有加，情

~12~

绪逐渐稳定。

方幼读诗书，受家庭熏陶。当时清庭腐败，革命思潮日益弥漫，以受报章宣传影响，孕育新思想萌芽，加之自身不幸遭遇，更坚定冲破樊笼决心，求学上进，先谋自身独立，进而为女界同胞求解放。经斗争，变卖首饰以充学费，进上海务本女校学习。章太炎夫人汤国梨、邵元冲夫人张默君及女师教师方志远、沈右揆都是同学。毕业后应聘执教常州。

服务桑梓，开展故乡女子教育是其素志，在社会舆论的推动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1912年3月遂在嘉兴创办私立女子师范（嘉兴女子师范学校）选定南门范蠡湖为校址。当时教育当局及有识之士均予助力，族弟方於笥（卿湘）尤为出力。筚路蓝缕，历尽艰辛，创校伊始，费用浩繁，经费不敷，脱簪珥，卖钗钏以济急用。学校班级根据学生增加及学制需要，逐步扩充，又因为师范生实习需要，在附近金明寺积谷仓旧址添设小学及幼稚园。1924年学制改革，改为公立中学，更校名为嘉兴县立女子中学。曾办高中及师资培训班，为期短暂，后设三年制初中五班，小学六年制六班，幼儿园一班。校舍除修理、改建吴公祠旧屋外，教室、风雨操场及部份宿舍均属新建。遴选师资比较严格，限于经费，聘请省立二中国文、史地、生物等课教师兼任。当时女子体操师资缺乏，为了提高学生健康水平，不惜高薪聘请日籍教师任课。在聘请教师过程中，对孚众望的教师，必竭诚敦请，如聘沈鲁瞻任教务主任，初不就，邀请再三，沈乃放弃待遇较厚的专校职务而到校工作。当时办学虽有公款补助，但停拨拖欠甚为严重。为使弦歌不辍，她以个人名义向私人息借垫付生活最感困难的教师的薪金，身后积欠数千元。

在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同时，她还参加社会活动，是妇女界移风易俗的开拓者。“五四”运动及其他爱国运动，女中师生积极参加，有一位同学曾被选任县学生总会主席之一（惜姓名已忘）。1927年北伐胜利，民情激昂，破除迷信反封建。她口头宣传，身体力行，率先剪发，为全校创。卅年间女师女中学生遍及嘉兴邻县乡镇，为普及妇女教育作出贡献。

刺绣是当时家庭女红之一，方英幼习刺绣，长娴其术，在校随师学习，艺益精进。创女师后，亲自授课传艺，女师刺绣负一时之誉，曾亲绣华盛顿像，出国展览。师生精绣十八件，解放后，在嘉兴市绣花展览会展出，现由市博物馆收藏。1937年抗战爆发，嘉兴军队云集，中学部驻军，停课散学。淞沪撤退，日寇进逼，学校停课，部份同学无法回家，校长派员工率领去新胜、乌镇等地暂避，后分别回家。校长与少数教职员工留校看管，其后校舍被日寇轰炸，校具、文卷荡然无存，遂于1938年2月只身离校，间道抵沪。

抵沪后，痛乡土沦陷，学校被炸，喘息甫定，复拟召集来沪师生、校友与嘉兴省立二中合办学校，再为故乡子弟教育出力。不料飞来横祸，1939年2月4日下午，偕嘉兴德心医院医师堂姐吟传，在福煦路西摩路（今延安中路陕西南路）附近步行，遇车祸，伤重不治逝世。1939年3月19日下午，嘉兴旅沪同乡会及县立女中旅沪校友在贵州路湖社举行追悼会。旅沪同乡及女师女中师生校友痛悼为发展妇女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一生的先驱者。

记抗战前海宁新仓的烧盐业

陈筱僧

现在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食盐，都是外地运入。可是历史上，海宁县新仓镇曾是大宗食盐的加工集散地。在民国期间也还相当发达。

当时，新仓镇的钱塘江畔有五家盐舍（烧盐工场）。其原料盐卤、木柴都是从钱塘江对岸的余姚等地以大木帆船运来，在盐舍里烧成食盐后，挑运到新仓镇河埠旁一个地名叫盐墩埭的仓房储存，再调运散发到各地。在新仓镇上驻有盐警察，他们管理盐务，侦察私盐。当时有所谓：“盐商木客、米贩子”之说。经营盐业也算巨商之列，经管盐舍（工场）的也被尊称为管舍朝奉。

这种盐舍建造得十分高大的叫舍。两旁在地下深埋着成排的大圆木桶，每只约有五米深，直径四米左右宽，作为储卤池用；居中以厚实铁板砌成长方形的烧盐灶，约有十平方米左右大。就轮流当班昼夜烧盐，五个盐舍每天烧制约近千担。顺着潮来水涨，木帆船靠岸，起卸盐卤、烧柴，随着退潮水扬帆返航。海边居民，靠海吃海，他们从海船上起卸货物，在盐舍烧盐；妇女劳力成群结队地挑运食盐，每担约100来市斤，肩挑三、四华里路，到新仓镇河埠旁入库。当时，国内有晒盐、井盐等，而烧盐在各种制盐方法中也算是精品。

直到一九三七年冬，战争的烽火弥漫新仓的前夕，时局异常混乱。为使国家物资不落日寇之手，当局打开盐库把大批食盐重入新仓港市河内。在此期间有几个亡命之徒乘混乱之机窜了出来，大发国难财，他们日以继夜地把仓盐廉价公开出售。来贩运的大小船只

陆续不绝，连晚上也点了汽油灯出售。经过许多个昼夜，库房食盐被盗卖殆尽。这几个人霎时成为巨富，但争咬“肥肉”，分赃不均而相互谋害，后来均落得极为惨淡的结局。

因战争的影响，钱塘江时被封锁，而卤柴等资源断绝等原因，盐仓拆坍，从此结束了新仓镇烧盐业的历史，距今已将近五十年。真是洁白如棉箩中盐，群力艰劳汗结晶，时过境迁半世纪，旧事重提记犹新。